

古典传统与当代旨趣：全球化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

文军

内容提要： 全球化是当今社会理论的中心议题。在社会学中，社会学理论对对全球化议题的研究兴趣实际上从古典阶段就开始了，但遗憾的是这种古典传统并没有在现代社会学阶段得到很好的发扬。在现代社会学阶段，社会学更多的是表现对民族国家、国家间的比较研究兴趣，这种状况直到当代社会学阶段才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并由此开创了全球化议题研究的全新局面。

关键词 全球化 古典社会学 现代社会学 当代社会学

—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待全球化，可以认为全球化既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现象，也不主要是一个现代社会现象，它的形态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在人类交往的关键领域，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到生态领域、文化领域等都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虽然全球化的时间节奏在不同领域有所不同，但是全球化的历史模式不时被巨大的变迁和倒退打断，这在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中也有所反映。

如果我们把 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看作是广义全球化的起点的话，那么，全球化的启动时间比现代化要早得多。现代性与社会学的诞生也都是在早期全球化(有人称之为原始全球化(proto-globalization)的背景中形成的，其主要特征就是民族国家的式微。但是，社会学自诞生之时起，就开始强烈地关注到了全球化现象，这从社会学古典传统中的有关理论研究中便可以得到例证。

在古典社会学理论阶段，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古典社会学大师(甚至包括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斯宾塞等)实际上都曾表现出某种对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的兴趣，都曾把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例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就采取了全球化的立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全球社会中来加以认识和分析。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西欧社会内源发展的结果，但同时又是世界历史的开端。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世界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具体的民族和国家之内，而且是全球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每个民族或国家的近代历史只是这种全球性的基本矛盾运动在这些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社会中的具体反应。总之，马克思有关全球化议题的观点至少包括：
(1)全球化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无论在技术上还是人类发展阶段上都是如此。
(2)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发展。(3)全球化造成了各种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流。(4)全球化为人类的最终的共同解放奠定了基础。

此外，涂尔干也曾谈到超越具体民族社会的“国际生活”和“全世界联合主义”，并指出 20 世纪将会产生一种关怀，严格地说，它按常规的社会学标

准不属于社会的层面，而是属于文明的或超越民族的层面。很显然，在涂尔干的眼里也存在着某种跨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因素。当然，与当代社会学家相比，古典社会学家对全球化因素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兴趣毕竟是十分有限的，正如罗伯森所说：我们必须承认，全球化是在社会学最关键的制度化阶段里形成社会学特殊旨趣的环境之一，但当时对全球化的兴趣的确相当微弱。

社会学不仅因其不关心社会外(extra-societal)问题而大大受损，而且现在它探讨社会间(inter-societal)的问题时仍然装备不良，全球化议题就更不用说了，尽管目前为纠正这一点人们已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的确如此，在古典社会学阶段，实际上既存在可供人们建立全球化理论的通道，也存在对建立全球化理论构成障碍的隔墙，尤其在所谓的古典社会学后期阶段，由于民族国家机构的硬化(hardeni ng)和扩展，民族主义的增强，社会学面临的局面变得特别复杂了。因而，那时的社会学家实际上是同时面临着“民族化”和“全球化”这样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学就是从这种困境中产生的。

阿尔布劳(M. Albrow)曾经从全球化角度在考察社会学的发展史,并指出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普遍主义(universalism)阶段、民族社会学(national sociologies)、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本土化(indigeniz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从社会学的这五个阶段的划分中，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的社会学实际上是渴望提供一门关于并服务于建立在永恒原理和验证过的法则之上的人性的科学，并把直接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类作为一种普遍的原则。到民族社会学阶段，社会学家们开始强调“知识产品具有民族文化的鲜明特点”，并将研究主题放入民族国家的参照系中。二战以后，伴随着民族国家社会学的崩溃，国际主义社会学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在第三世界，又形成以“本土化”为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各种“地方性的”社会学研究明确地出现在全球场景之中，直到当前社会学全球化阶段的出现都是如此。而社会学的全球又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是所有以前阶段的间接结果。全球化的原理“来自单个社会学家与地球上所有地方的其他人一起工作的自由，以及评估他们身处其中的世界性过程，并对其进行研究的自由”。很显然，阿尔布劳联系全球化提出的社会学发展史纲，越来越关注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关注分析全球状况本身这个问题。全球化并非单单意味着社会学家之间可以开放地自由交往，而且还意味着社会学自身的多样化与跨国化，更意味着社会学将要反映的社会现实的多样化和整体化趋势，而这恰恰是我们社会学研究今后所要面对的主要任务和根本主题。

二

社会学发展到了现代社会学理论阶段以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社会学家的视野也开始从关注整个人类的某些全球化因素转移到注重某一社会的内部或社会间的现象研究。最为典型的的就是社会学中的“社会变迁”理论，其主要考察的就是欧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其研究的对象就是一个具有相对“封闭性”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到1950年代后形成的现

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所谓的发展理论，虽然所考察的对象和范围有所扩展，但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跳出“社会(民族国家)”或“社会间(民族国家间)”的研究范围。直到1960-1970年代后期，这种状况才逐渐有所转变。而社会学家在对作为整体世界的研究中做出的第一次集体性努力，主要是按照国际关系社会学这种想法进行的。可以说，直至今今天仍然有社会学家是从“国际关系”的意义上思考超社会(extra-society)或全球化议题的。

其实，全球化议题不仅是现代社会学无法逃避的研究主题，而且它还能为当代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社会学在西方一直被认为处在全球化议题研究的最前沿，正如胡格维特(A. Hoogvelt)所说：“尽管当今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已经渗透到了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但可能这样说才是公平的：在使全球化具有严格的、前后一致的理论地位的努力中，社会学家已经处在最前沿。社会学家关于全球化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克服全球化对话中的局限，而这些局限曾给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带来了很多的困扰”。然而，社会学理论要对全球化进行更全面、彻底的研究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即使有在文章中论及全球化议题的，其绝大多数也只是从单一的学科角度来讨论全球化的，其中尤以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为最。社会学理论发展到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阶段以后，并未很好地继承社会学古典传统中对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的理论兴趣，而多半是站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对一个个民族国家或几个民族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因此，其分析框架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即使有些社会学家的研究已经转向了全球化或跨国研究，他们通常也不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真正系统性的变化，不认为全球化正在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本身。全球化研究被认为只不过是社会学比较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其不仅在思维方式上难以突破二元模式，而且在研究范式上也常常不由自主地固守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

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民族国家体系还没有作为一个主体被超越或取代的现阶段，完全放弃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元的做法其实并不可取。全球化的发展，既有可能削弱与民族国家相联的民族感情，也有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社会交往横向延伸并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部分时，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地方自治与区域认同正日益增强的势头，这就是罗伯森所指称的全球地方化(globalization)现象。因此，在全球化研究中，我们既不能以个别的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作为研究单位，也不宜只以一定的“全球性体系”作为研究单位。其实，在全球化发展的初级阶段，由现代社会学而形成的“现代化研究范式”和由当代社会学而促成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都不能以偏概全，而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走向整合，才有助于更全面、更彻底认识全球化现象。

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著称的宏观社会学、发展社会学、比较社会学等现代范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例如，当中国社会正试图加速自己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的时候，整个外部的发展环境已经不再简单地只是如何与其它民族国家发生关联的问题了，而且也包括

着如何与越来越具有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力的跨国力量或全球力量发生关联的问题。这种情势，迫使许多原有的社会学理论和视角都面临着改造或转换的压力。如何将现代社会学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体现这种情势和压力，并实现“创造性的转换”，是至关重要的。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现代社会学知识(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现代社会学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究其原因，是因为整个现代社会学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的，是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的产物，由此决定了其根本使命与核心主题就是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因此，当代社会学必须突破现代社会学知识体系上的局限性，实现由民族国家向跨国体系和全球体系的转变。这不仅是整个全球化研究的需要，也是社会学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的需要。

在笔者看来，全球化既不是一种历史现实，也不是一种单一的、固定化的理想状态(如全球市场、全球文明、全球社会等)，它既不是对当前社会事实的经验概括，也不是指作为社会类型的一种“理想”而提出来的。全球化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只表明一种人类社会整体化的发展趋势，是最接近于全球社会的一种理想类型，而不是全球社会的本身。在全球化议题研究方面，现代社会学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不仅必须面对这一重要的研究主题，而且还能比其它任何一门单性学科取得更大的成绩，并将在整个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由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具有强烈的综合性特征，这不仅表现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知识内容全面广泛地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而且表现在学科建设上是其具有十分强劲的渗透性，可以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甚至绝大多数自然科学交叉而形成一门新的分支社会学。社会学的这种综合性特征不仅使它对诸如全球化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还可以使其在研究中不断吸收各门学科的知识内容和具体方法，从而发挥出其它单性学科所不具有的优势。此外，社会学的学科功能也决定了它必须面对不断变化了的社会现象，而全球化作为一种正在出现的、并不断变化的重要社会现象，就不能不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之中。社会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关注现实、认识并改造社会。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成为世纪之交发生的各种事件的世界历史背景，尽管不同的人对全球化持有不同的态度，但谁也无法否定全球化给当今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如何认识和理解全球化，发挥社会学描述、解释、规范和预测全球化的功能，已成为社会学研究责无旁贷的分内之事，这也是历史所赋予社会学的再次发展机遇。

三

1990年代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朗化，各种对全球化议题的研究也风起

云涌，在当代社会学中，更是视角纷呈，大显神通。社会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视角中来寻求对全球化的恰当理解和合理解释，从而大大促进了全球化的研究和社会学自身的发展。当代社会学中有关全球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从一个侧面可以看作是当代社会学者在积极寻求社会学变革的一种努力。尽管这种努力至今还看不到它给整个社会学研究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但无论如何它至少表明了社会学者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全球化现象及其对于当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尽管有人把全球化的历史推到了 500 多年前的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甚至更早的时间，而且在这 50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也不乏人们对这种人类社会由多中心时代走向全球性时代的社会变迁的种种思考，但是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全球化及其理论研究应该至少到了 20 世纪中后期，其标志性事件是新技术革命的来临、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确立、全球性问题的形成与扩展、全球共同意识的崛起与强化等，这不仅在实践上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增强了全球化的影响力，而且在理论上也深化了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学者们纷纷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角度来考察与研究全球化议题，并不断加强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社会学对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始于 20 世纪中后期，六七十年代主要有索罗金(P. Sorokin)的全球趋同论、雷蒙·阿隆(R. Aron)的国际社会论、贝尔(D. Bell)的后工业社会论、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七、八十年代又出现了托夫勒(A. Toffler)的超工业社会论、奈斯比特(J. Naisbitt)的大趋势论，九十年代则形成了更具有全球化研究针对性的吉登斯(A. Giddens)的制度转变论、罗伯森(R. Robertson)的文化系统论、斯克莱尔(L. Sklair)的全球体系论和卡斯泰尔(M. Castelle)的网络社会论等。

当代社会学家对全球化议题的不同研究，基本上代表了 199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家在全球化议题研究上的基本理论观点。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进程并非直至今日方始出现的一个当代的突发事件，但以往却很少有社会学理论上的努力从正面去反映它，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毫无疑问，全球化从发轫之初到形成洪流，并最终成为人们不得不正视的一种新的社会型态，社会学理论对此是不能熟视无睹的，而应当通过对它的追踪和反思来达到一种切实的把握。

对于社会学研究的变革而言，当代全球化理论的形成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为社会学研究者树立了“全球观念”和多维价值观，改变了社会学长期以来的思维“惯习”，而且能够将不同“场域”中发生的事态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大大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学术视域。在全球化背景下，虽然国家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共同体，而且还是讨论许多问题的现实语境，但是，情况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民族国家作为社会学长期研究的一个边界对象和分析单位，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共同体，但不再是最大的共同体了。在全球化中，社会学研究的实际对象“国家—社会”的那种同构性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意义在缩小，而社会意义将放大。国家将处在基于广泛交往的普遍联系之中，而且这种普遍联系更加表现为世界历史这个人

类文明史上空前的复杂联系的体系，新的情势决定了国家不再是意义自足、自我定义的最高实体，而是成为世界历史体系中的一个结构要素，成为国际政治格局的一种成份或力量，因而根本地是作为普遍交往和复杂联系网上纽结或元素而存在，并且在互动格局中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民族国家本身在不断被重塑的同时，全球化也正在产生着一种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东西，即一个全球性社会。而且，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它都在动摇我们现存的生活方式。至少在目前，这个全球性社会不是由集体的人类意志所推动产生的全球秩序，相反，它正以一种不固定的偶然的方式出现，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¹¹这些影响从政治、经济、文化、资本、技术、产品一直到信息等都对我国三百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制度体系提出了挑战，使得建构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并为民族国家体系提供合法性解释的社会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对此，如果没有一些人从人类前途和共同发展方面进行考虑的话，就很难有一个正常、均衡的国际秩序了，也不会有一个全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全球化是在全球极广泛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一种互动关系，既然是互动的，就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任何单一的标准和简单化的理解都是不合理的。因此，无论是在现实操作层面还是理论研究层面，我们都应该提倡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全球化的意识、全球化的胸怀，以与全球化的现实进程相适应。

社会学由于其学科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综合性特征，因此在对全球化理论的探讨上，总是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角度来全面整合全球化理论所代表的真实内涵，并用“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工业化、都市化在全球普及后带来的社会的各种同构现象。但由于社会学浓厚的哲学理论背景和突出的面向现实特征，使得许多社会学家在解释“全球化”时一方面从理论上积极寻找对全球化的理论化、制度化诠释，另一方面也从现实和未来发展角度寻找对全球化最为直接的经验性概括与描述。纵观当代社会学家对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演变轨迹，我们可以发现，近20多年来西方社会学对全球化议题的理论研究至少有如下几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1)研究领域的拓展。从早期的较注重物质层面的研究逐步拓展到精神层面；从单一的领域转向了所有的领域。全球化议题在社会学的积极参与下，首先在研究领域上打破了以往只注重在经济领域、国际关系领域等单一领域中的进行探讨的惯例，促使全球化研究能够在具有“全球领域”的背景中展开，从而有力地拓展了全球化的研究视野和疆域。全球化是一个多层面的、不断分化的社会现象，其本身就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因此，不能把全球化看作是在某个单一领域中进行的事情，相反，应该把它看作是在社会活动的所有关键领域中不断扩展的相互联系模式。

(2)研究力度的深化。社会学对全球化议题的介入，不仅为全球化研究提供了多种研究视角和途径，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深化了全球化议题的研究，

使全球化研究从早期的简单化、描述化的研究逐步深化到抽象化、理论化的研究，并由探究影响全球化的物质系统深入到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从细究全球化的单一动因或决定性因素转向寻找多种因素的解释，既看到了全球化同一性的增强，又看到了其分异性的扩大，使全球化研究在纵深两个层面上都得到了极大地发展。

(3)研究重心的转移。随着全球化研究议题的多学科参与，原来那种以经济、政治、军事为重心的研究正逐步转向了全球文化、生态的研究，这一点在1990年代以后的社会学研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其所谓的世界体系在早期就是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也是人们称之为经济主义取向过浓的主要原因)，而到1990年代以后，沃勒斯坦也开始关注文化现象了。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全球文化、生态的重要性的崛起是分不开的。全球化作为一种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其在很大程度上将表现为一种新的全球文化的诞生。

(4)研究方法的创新。社会学对全球化议题的研究，在方法上将给整个研究带来巨大的创新，使其从早期简单综合的问题研究、现象研究、趋势研究逐步发展为复杂抽象的制度性研究、结构性研究和系统性研究；从单线条探讨全球化进程的方法转向了重视不同轨迹的全球化进程。无论是在具体方法的使用上，还是在方法论和研究方式层次上，全球化研究方法不断系统化，跨学科方法运用得也更为成熟、突出，从而大大促进了整个全球化研究的发展。

全球化理论的出现的确实为社会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界，尤其是一系列新的概念、观点和视角的提出，给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其无论在认识论还是一般预设前提上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说，后现代思想主要是从对立面来解构现代社会学知识体系，并通过质疑与批判来达到重建社会学体系的目的的话，那么，全球化理论则主要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维护社会学知识的成长，并通过修订与扩充来达到提升社会学已有知识传统的目的。但是，也如同各种后现代社会思想一样，现有的全球化理论并没有为自己所处的历史时刻以及1990年代后发生的各种事件提供必要的分析工具，而这一时期恰恰是全球化话语获得全球性声誉和影响的重要时期。¹²尤其在社会学研究的变革上，全球化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现有的社会学研究，其所谓的“全球性”研究或“全球化”视角也多半停留在民族国家间、社会间、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之上(这也许与当前全球化本身发展的有限性有关)，而在社会学思维方式与研究范式上，也没有“跳出”现代社会学知识已有的困境，这无疑在促使着我们为实现社会学研究的变革继续努力。当然，全球化理论尽管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在当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仍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很明显，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时，我们更需要新的理论和研究策略，我们必须继续发展超学科的理论方法，创新出更具适应性和恰当性的话语方式和研究范式。

注 释：

当然，如果我们从广义上把全球化的启动年代定位在 1500 年左右，那么民族国家的形成其实与全球化的开始是同步进行的事件，而且，民族国家甚至可能是全球化的结果，但在全球化的当代阶段(既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化阶段)，全球化反而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实力。

Durkheim,E. and Mauss,M.(1971) ‘A note on the notion of civilization’, *Social Research*,58.

Robertson,R.(1992)*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Culture*, London:Sage,Charpert9.可参见中文翻译本：[美]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Albrow,M. and King,E.(eds.)(1990)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 London: Sage.PP6-8.

Hoogvelt, A.(1997)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 London: Macmillan,P116

笔者认为，尽管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民族国家体系及其参照系无疑正处于衰退状态，但在可以预见的相当一段时期里，民族国家还将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还将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舞台。因此，目前，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元的传统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还不能完全被抛弃。

Robertson,R.(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P173.

文军：《范式整合：全球化时代社会学研究的变革》，南宁：《学术论坛》，2001 年第 3 期。

黄平：《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北京：《社会学研究》，2000 年第 3 期。

文军：《90 年代西方社会学视域中的全球化理论评析》，广州：《开放时代》，1999 年 9 月号

¹¹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4 页。

¹² 文军：《西方多学科视域中的全球化概念考评》，北京：《国外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